



# 刘伯承千里追“韩信”

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。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，他一直惜才、重才，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。

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个参议室，那里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，实际上是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“智囊小组”。一天上午，刘伯承来到参议室，他颇有预见性地对大家说：“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看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。可是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，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要培养和寻找各种专门人才，先把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搞好。”

参议室的同志们听后连连点头。顺着刘师长的思路，一位姓李的参议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办合作社，这样才能发展生产。”“办合作社是个好办法。”刘伯承思索着说：“关键是要从农民中培养合作社干部，要有懂农业经济和技术的人，许多事现在就可以着手做了，最要紧的，是要广罗人才。”参议们感叹地说：“在我们中国，



这类人才太缺乏了……”

大家一时陷入沉思之中。几分钟静默之后，李参议突然一拍脑袋，高兴地说：“有了！”原来，他想起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位同学，过去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，便说：“我有一个姓程的同学，是懂得经济的内行。”“哦，你怎么不早说？”刘伯承兴奋地站了起来，有些急迫地问道：“你那位同学现在在

哪里？”“前几天刚经过太行区，分配到鲁西北去当副排长了。”

刘伯承又详细问了问情况，然后风趣地说：“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才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之大吉了呢？”

参议室的同志们都没有在意这件事，以为人已经分配走了，又只是一个搞经济的，谁会有工夫去操那么多心呢？然而，刘伯承却不这样认为。他

回到师部以后，马上把作战科长找来，说：“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姓程的同志请回来。”作战科长有些为难地说：“人已经走了好几天，怕不好找到了吧。”刘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：“要派人去追！”“是。”于是，作战科长派出通讯员跟各个工作组联络。当问到第一站时，对方回答说：“程同志前天已经离开这儿，往河北省的涉县去了。”作战科长立即指示：“再往涉县去追。”可是，涉县方面的答复同样地令人失望：“此人昨天已经走了，请到磁县方面查一下吧。”于是，通讯员又急忙快马加鞭奔向磁县进一步去查找。第二站、第三站、第四站……一直追到了冀西的铁路边上，才找到了这位姓程的同志。

几天后，刘伯承让人通知李参议，请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谈谈话。两位“抗大”老同学见面之后，李参议惊奇地问：“你怎么又返回来了？”那位姓程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李参议听后，禁不住赞叹地说：“当年，‘萧何月下追韩信’。今天，刘师长也是广揽人才，追你这个‘韩信’呀！” ■ 孟红 据《北京日报》

## 钱锺书的求真求实

1978年初，北京语言学院的几位教师经过协商，打算编纂一套名为《中国文学家词典》的丛书。当时，作家钱锺书的小传落在了一位姓武的老师名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武老师便准备上门拜访钱锺书，以便写出第一手资料。

出发时，武老师是带着一种极为单一和明确的任务去的，当时，他手里还攥着一纸事先拟好的“调查提纲”。按以往的惯例，在寒暄过后，当事双方一般都会直奔“主题”。然而这次却成了例外，僵硬的答问被亲切而随意的叙述所代替。钱锺书不仅热情地回答了武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，同时还反

复叮嘱他一句话：“（小传）写成后，一定让我看一看。”

回校以后，武老师便开始了搜索资料和编写工作。经过反复修改，武老师拟成一篇千余字的小稿，最后誊好后寄给了钱锺书。当时写这篇小传时，武老师已经尽量做到下笔谨慎，内容平实有据，同时去掉浮词虚语，最大限度地写出接近他心目中钱锺书的风格。

武老师以为，收到钱锺书的回信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，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钱锺书就将底稿寄了回来。同时，他还托人带来口信，要武老师和他电话联

系。钱锺书在电话里严肃地对武老师说道：“必须以我修改过的为定稿，不容再改，否则，不入词典。”钱锺书的语气显得异常坚决，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。

当武老师展读了钱锺书的改稿后，发现对方删除了3处地方。最让武老师感到诧异的是，钱锺书竟然删除了称他为“著名学者”中的“著名”二字。而以当时钱锺书的威望和成就，称他为“著名学者”一点也不为过。然而，钱锺书却严厉地拒绝了。

求真求实是钱锺书的处事风格，也是他一贯的做人风格。

■ 姚秦川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赵元任作曲

赵元任是蜚声海内外的语言学家，被誉为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”，1924年，与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“四大导师”。赵元任还精通音律和各种乐器，终身与钢琴为伴，是一位深谙中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大师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22岁的赵元任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欧战迫近，何等荒谬！”他满怀愤慨地创作了钢琴曲《和平进行曲》，发表在1915年1月出版的《科学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，表达了内心反对战争、向往和平的美好寄愿。

《和平进行曲》按照西方大小调和声体系与进行曲风格创作而

成，赵元任在《自传》中曾提及“它完全属于西洋风格”，是他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萌芽时期的一曲模仿之作。尽管该曲曲式短小，技巧简单，但开创了中西方音乐融合的先河，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赵元任积极参与各类音乐活动，曾参加歌剧《阿依达》的指挥和演出，并陆续创作了百余首歌曲，风格新颖，音乐形象鲜明，曲调优美流畅。其中，与刘半农合作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意韵悠长，脍炙人口，穿越时空，传唱至今，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和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；《卖布谣》《劳动歌》《织布》等作品，

堪称中西方钢琴音乐创作风格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；《抵抗》《自卫》《儿童前进曲》《中华，我中华》《看，醒狮怒吼》等抗战歌曲，慷慨激昂，催人奋发。

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曾由衷地赞赏道：“像（赵元任）这样一位从事理科、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，对音乐来说，顶多是个业余的了，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。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与成就”，赵元任“是一位能把科学、语言、艺术与人生融为一体，把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的大师”。

■ 周惠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季羨林的拳拳之心

2001年夏天，季羨林的亲炙弟子张保胜到北大朗润园看望季先生。季羨林拿出《永乐大钟铭文真迹》一函，问张保胜对蓝扎体梵文有没有兴趣，张保胜看了激动不已。季羨林遂命令张保胜承担大钟梵文的解读和诠释任务。张保胜欣然领命，并请恩师季羨林担任特约顾问。

季羨林慧眼识人，张保胜在梵文的辨读方面下过工夫，也颇有建树。季羨林相信他可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，解开这座有近600年历史的佛钟的奥秘。而这座大钟梵文的解读，对陀罗尼的研究，对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张保胜从解读和考据等不同的八个层次展开，废寝忘食，孜孜以求，如同沧海觅粟。季羨林也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研究初见成效。2001年11月19日，天气阴冷，北风呼啸。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梵文陀罗尼，90岁高龄的季羨林不顾众人劝阻，坚持坐在寒风里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。那时他已患病，只是不动声色，在那里硬撑着，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。

事后他的亲传子弟梁志刚心疼地对季羨林说：“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，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。”

季羨林回答说：“有必要。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，有的我还不了解。”一句“有必要”，不仅是对张保胜的鼎力支持，也彰显了季老对待学问和学生的一颗谦逊而又挚诚的拳拳之心。

2006年，在张保胜的不懈努力下，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保胜的重要专著《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》一书，季羨林满怀深情，欣然命笔写序祝贺。 ■ 崔鹤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